

IMF能够(而且必须)颠覆自我

在快速变革的世界中，IMF需要成员国的支持

穆罕默德·A. 埃尔-埃利安

照片由ALLIANZ提供。

要是今天没有IMF的话，那么各国会极力呼吁创建这样一个组织。在我看来，这一点几乎毋庸置疑。

如果没有IMF，当某个国家突然爆发危机，而且危机蔓延到其他经济体时，那么国际上就没有真正的最终贷款人。各国需要一种更高水平的低效自我保险，包括持有大量昂贵的国际储备金。在追求狭隘利益的过程中，这些国家更愿意把经济工具变成武器。在保持全球经济增长和稳定的过程中，各国可分享的信息会减少，协调经济政策的空间会缩小。

市场的秩序和效率都会变差。市场参与者会错失IMF的国家和地区报告中包含的信息、分析和数据，更别说各方翘首期盼的、定期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财政监测报告》以及《全球金融稳定报告》。它们将无法得到IMF针对各国的政策

提供的第三方验证，也无法获得其贷款所发挥的重要促进作用。

这一切有可能加大政府和市场失灵的风险，使政策失误和市场事故更频繁地发生，从而削弱各个国家实现高速、包容性增长并确保金融稳定的能力。而且，不要忘记，由于全球经济目前面临的挑战，这些风险已变得更严峻（见本期《金融与发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现状与未来”）。

假如今天要建立IMF，那么这个新组织与过去75年来我们所熟知的那个组织有什么不同呢？这个新组织将保留其创始人构想的很多结构性特点。依托其面向所有国家的会员身份以及高素质的员工，该组织将继续发挥其核心作用：监督每个经济体及世界经济的实力、向需要资金的国家贷款、帮助政府培养制定有效的经济及金融政策的能力，成为各成员国进行磋商的平台。

然而，在国际制度经历着有序的调整和转型的过程中，它应该有更大的能力，而且必须发挥更大的作用，而不只是领导者和推动者。要做到这一点，它需要将更多的精力投向以下方面：如何组织其员工；如何将科技、社会不公正和可持续发展等问题纳入其核心活动；其执行董事会、管理团队和员工如何相互影响。如果成员国不能单独且共同履行自身的责任，那么就不可能实现上述目标。

一个改革后的IMF将拥有更高的份额来支持其活动，同时实现成员国之间的现代化分配，以及更容易获得借入资金。它将保持各种不同的借贷工具，以便满足其成员国的不同需求。在认识到有必要考虑其他重大宏观问题，如气候变化产生的影响时，它将重点关注自身的核心竞争力。同时，它将与其它多边和区域性机构协作。在国

际多边舞台上，其“同侪之首”的地位将是其良好声誉的必然结果，同时，国际清算银行是最高效、最技术化管理和最有效的国际组织。

与时俱进

即便如此，全球还应更关注 IMF 的结构和运行的某些方面，那些限制其效力、妨碍其信誉、对声誉造成过大挑战的方面。如果 IMF 要想适应全球经济的重大变革，这些方面便是今天需要关注的。由于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的发展、国家权力结构的不断变化、对于机构和专家观点普遍失去信任、国家和国际层面上经济及金融关系的不断变化，以及造成全球碎片化的因素，全球经济变得日益复杂。

在全球金融危机暴露出其运行中存在的严重不足后，IMF 已证明其有能力重塑自己。在监管方面，它强化了预警方法，而且更重视社会和可持续关切。在贷款方面，它推出了全新的融资工具，拥有更高和更多的前期资金以及更快速地拨付资金的机制。它已经将部分重心转向贷款的条件性，将最终结果纳入考虑，而非仅仅关注政策建议。

在其治理及其他相关调整的过程中，它已经给予发展中经济体更大的发言权和代表权，将中国的货币纳入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中，加强风险管理。它扩大了内外部沟通，重新启动其内部监督部门——独立评估办公室。

即便取得了这些进步，IMF 也认识到需要做出更多的调整。管理层和员工强调，有必要在几大项目上加大推动力度，包括根据各方对其的要求，增强该组织的资金实力。借用 2018 年有关 IMF 治理的独立评估办公室报告，“责任和代表权一直是人们越来越关切的问题，而如果这些问题不能得到妥善解决，那么会影响该组织的合法性，乃至最终的有效性。”

但是，在日益多极化的世界中，金融互联互

通极为紧密但不断变化，目前急需在机构、国家和国际等三个层面上采取更有效的措施。

在机构层面上，IMF 的资源和专业知识和仍过于倚重于经济学和政策，而不是社会和金融市场的影响。非银行金融和社会与经济联系仍显滞后，通常被视为一种事后的补救办法。行为科学与决策洞见利用不足，无法支持从预期状况向可行及最终有效状况的转变。如果无法在性别、教育资格、专业经验和文化背景等方面进一步丰富认知多样性，那么这些方面就很难有明显改观。

目前急需在机构、国家和国际等三个层面上采取更有效的措施。

这种转变也需要将治理、社会平等和公正问题更好地整合起来。这意味着要像创始人希望的那样，更平等地对待逆差国家和顺差国家。同时，也要求更虚心地吸取教训，无论这些错误是持续性的预测错误（例如，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对于经济增长前景过于乐观）、计划设计不完整（包括对于极端紧缩的成本和风险重视不够）、大股东占有份额过大，还是对于持续的债务积压如何彻底破坏一个国家的增长势头未能给予充分的关注。

成员国可更主动地接受 IMF 作为可信顾问的角色。它们应更认真地考虑狭隘的政策措施相关的溢出和回溢风险。倘若它们需要借款，就必须抵抗一种倾向，即等到最后时刻才找 IMF 出手相救。它们必须更积极主动，并态度鲜明地在该组织资金所支持的调整及改革计划的设计和和实施过程中承担责任。

总体来说，成员国应采取更大胆、更果断的措施，在选拔总裁和副总裁时采取基于优秀表现（而非基于国籍）的方法，更快地开展更多的工作，从而让发展中经济体拥有适当的话语权和代

如果该机构要想在国际制度中发挥重要的作用，那么它必须更快地适应现实。

表权（尤其是相对于欧洲国家），同时更快地增强IMF的借贷能力。在这些领域，继续拖延会增加金融危机以及持续低速和不充分的包容性增长的概率、进一步侵蚀机构信誉和地位、造成国际制度的碎片化。

自布雷顿森林体系于75年前创建以来，全球经济的结构与运行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虽然有人可能会指出IMF要么改变的速度过慢，要么只是在出现危机时才会做出改变，但是，在面对目前的现实时，就调整自身的运行实践而言，该组织是多边机构中最灵活的一个。随着技术创新以及不同的权力和市场结构推动变革，如果该

机构要想在国际制度——那种对该组织成员国的绝大部分人的幸福至关重要的国际制度——中发挥重要的作用，那么它必须更快地适应现实。

寻求平衡

1983年夏，在我担任IMF的年轻的专职经济学家的第一周内，我突然有个想法：IMF不仅在分析每个案例时要足够敏感，而且在对待成员国时要态度一致。我在该机构工作了15年。在此期间，我目睹了这个想法被付诸实践。要实现平衡未必总是一件易事，尤其是当政治问题和过时的心态及权利成为阻力时。然而，根据员工和管理层的灵活判断、承诺和及时反应，这样做才是成功的关键。

在全球经济转型加速，技术创新不仅改变着我们的工作内容，而且改变着我们的工作方式，愤怒的政治与国家经济政策管理相互影响，跨国经济和金融联系面临更大的碎片化压力时，对于IMF而言，实现平衡将更为重要。这需要一种自我颠覆，可大部分机构很难做好这一点。但这要比降低价值、影响变小、声誉受损要好得多。

IMF内忠诚的员工恐怕比任何人都清楚这一点。他们非常愿意加快这种有序的、积极的自我颠覆。在富有远见卓识的领导层的带领下，他们有能力做出回应，积极主动地，而不是从弱势地位出发，但如果不能授权他们的股东以及该组织的成员国采取行动，那么他们也不会成功。FD

穆罕默德·A. 埃尔-埃利安（Mohamed A. El-Erian）是安联集团首席经济顾问，曾任IMF副主任。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播客

